

# 文化安全视域下的话语陷阱研究——以境内外媒体涉港报道为例

胡珀 茹莺骞 张靖曼 翟宁采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省南京市，210000；

**摘要：**本文从文化安全角度出发，通过考察境内外媒体涉港报道，剖析其中话语陷阱表现，探究其形成、传播策略及对文化安全的影响。在全球化下话语权于国家总体安全愈发重要之际，意识到话语陷阱背后意识形态渗透与文化霸权逻辑，进而提出应对之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文化安全；话语陷阱；涉港报道；意识形态

DOI：10.69979/3029-2700.25.10.036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全球化浪潮里，文化安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高度，成了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撑。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过，“话语即权力”。如今在国际话语体系里，西方国家把控着话语构建规则，把意识形态掺进媒体叙述中。我国综合实力虽不断增强，可国际话语权和话语传播体系还无法与之抗衡。当下国际舆论环境愈发严峻，话语权争夺也愈发白热化，境内外媒体在涉港报道里屡屡设置话语陷阱，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在此情形下，深入探究境内外媒体的话语陷阱、剖析其背后动机、制定应对之策，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

### 1.2 研究问题

本研究把关注点放在境内外媒体于涉港报道里设置话语陷阱这一现象上，着力去解答几个关键问题：境内外媒体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构建话语陷阱的？在话语陷阱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深层动机？面对这些话语陷阱，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本研究期望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深度剖析，揭开话语陷阱的本质面纱，弄清楚它对文化安全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而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应用贡献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 2 相关研究述评

### 2.1 文化安全、话语权与话语陷阱

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中

英将文化安全广义上界定为“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基本制度、语言符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等主要文化要素不受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能充分享有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与不断创新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领域的主要任务，即“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话语权是指通过语言、符号和传播手段影响他人认知、塑造舆论的能力。福柯提出，话语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权力的体现。在国际关系中，话语权往往与经济、军事力量并重，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话语权的国家或集团能够主导国际舆论，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叙事框架。

话语陷阱指的是通过精心构思的语言手段诱导别人在特定议题上陷入思维的困境或价值的冲突。这种陷阱一般有隐蔽性、诱导性和破坏性，就是用语言的力量制造认知偏差或施加舆论压力。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博弈的加剧，话语陷阱成为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工具。美西方国家还利用“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话语陷阱学说，将反华言论与仇华观点隐匿于其中，意图以此达到污名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图谋。

## 2.2 关于涉港报道的境内外研究

境内研究方面，以“涉港报道”或“中国香港报道”为篇名关键字检索，近 30 年来，境内学者共发表相关学术期刊或学位论文 168 篇。多从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分析涉港报道中的话语策略。例如，《意识形态偏见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选择框架》中指出，西方媒体为争夺话语权，维护西方文化霸权，在报道中采取“双重标准”，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根据研究，大陆媒体在报道中国香港问题时，注重强调“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同时揭露外部势力的干预行为。学者还关注到新媒体环境下涉港报道的传播效果和舆论引导策略。

境外学者在研究涉港报道时，往往从国际关系和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深入剖析其中的话语博弈。他们仔细研究了西方媒体如何通过选择性报道和特定的框架设置，来构建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西方媒体在涉港报道中长期采用“他者化”新闻框架，将中国构建为“落后、不民主”的形象。师文和陈昌凤通过《纽约时报》涉港报道在 Twitter 上的传播模式研究，揭示社交机器人在涉港话题传播中强化了西方媒体的叙事框架，其扩散模式更倾向支持抗议者，进一步扭曲了报道的公正性。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国香港本地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时，立场往往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涉港报道的研究领域，学术界目前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者们的研究偏向碎片化，缺乏整体性框架，使得对涉港报道的理解不够深入，进而理论探讨也显得零散。此外，现有研究并未充分利用文化安全视角，需要更深入地挖掘话语陷阱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

## 3 境内外媒体涉港报道中的话语陷阱分析

### 3.1 文化安全视角下的话语陷阱分析框架

话语主体即设置陷阱的主体。针对中国香港问题设置话语陷阱的主要推手，是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及其控制的媒体集团。具体表现为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施压与资金支持，操控《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将政治议题包装成“新闻报道”。英国政府则利用 BBC、《卫报》等平台，配合其“价值观外交”战略，将意识形态渗透伪装成“客观叙事”。这些机构并非单纯从事“媒体报道”，而是沦为政治操纵下的意

识形态武器，其行动本质是维护西方全球霸权、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布局。

对话语内容的分析重点考察话语陷阱存在的形式。典型陷阱是以“民主”为名的概念偷换。法律本质的混淆有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将中国香港国安法污蔑为“限制自由与人权”，却刻意隐瞒两大核心事实：国安法针对的是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但西方媒体却将其歪曲为“全面打压中国香港自由”；将中国香港市民理性表达爱国情怀的行为（如联署支持国安法）污蔑为“破坏自由”，却将暴徒纵火、袭警、破坏公物的暴力行径美化为“和平民主抗争”。还有法律问题政治化、国内事务国际化：此类操作不仅为外部势力干预中国香港事务制造借口，更直接损害中国香港市民福祉，危害中国主权与安全。

话语策略研究重点关注对真相掩盖的方式以及媒体做出的偏向性报道选择。西方媒体通过以下手段扭曲事实。一是片段化叙事，截取街头冲突的零星画面（如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却刻意隐瞒暴徒先向警方投掷汽油弹等关键事实，并通过断章取义的标题（如 BBC 将标题定为“中国香港警方暴力镇压示威者”）误导公众。二是双重标准叙事，将中国香港暴徒的暴力行为轻描淡写为“抗议冲突”，却将西方国家内部镇压骚乱的行为（如美国“黑命贵”运动中的警方行动）美化为“维护法治”，暴露其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三是虚构“人权标准”，通过选择性引用西方资助的“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报告，将中国香港问题与种族歧视、难民危机等全球性议题强行关联，试图裹挟国际舆论。

话语影响层面应该关注话语陷阱对国家文化凝聚力的破坏。西方话语陷阱的深层危害在于瓦解文化认同、制造社会分裂。文化根基的动摇：通过散布“民主=自由”“爱国=专制”等虚假对立，误导中国香港青年否定自身文化根源，甚至将“港独”包装为“身份认同”，破坏“一国两制”的文化根基；“颜色革命”的催化：2019 年中国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西方媒体与政客合谋，将街头暴力美化为“民主革命”，煽动极端分子冲击政府机构、瘫痪公共交通，其手法与乌克兰“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如出一辙，旨在制造混乱、瘫痪治理；文化殖民的延续：此类陷阱本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通过操纵叙事输出价值观，否定中国发展模式、妖魔化中华文化，最终服务于其“分而治之”的战略目标。

西方政府将媒体话语武器化为“软刀子”，以“民主”“自由”之名掩盖政治私利。其策略不仅旨在扰乱中国香港，更企图瓦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对此，我们需揭穿其话术把戏，坚定文化自信，以事实与法律回击虚假叙事，捍卫国家主权与文化安全。

### 3.2 典型案例分析

#### 案例一：境外媒体利用“民主”“自由”话语标签歪曲中国香港问题

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西方媒体如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频繁利用“民主”“自由”等话语标签，将中国香港问题歪曲为“人权”问题，试图抹黑中国形象。例如，《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偷换概念，声称中国香港国安法“限制了中国香港的自由和人权”，故意选择性报道，忽略中国香港国安法旨在维护中国香港社会稳定的事实。将中国香港的爱国行为歪曲为“破坏自由”，而将暴徒的暴力行为美化为“民主抗争”，从而误导国际舆论，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报道与中国香港国安法的真实目的和实施效果背道而驰，是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政治意图下进行了恶意歪曲，背后隐藏的是西方维护自身全球霸权、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谋。

#### 案例二：境内媒体运用“一国两制”“民族复兴”话语构建积极国家形象

境内媒体在涉港报道中积极运用“一国两制”“民族复兴”等话语，与境外媒体形成鲜明对比，“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结合实际情况构建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有力地反击了境外媒体的不实报道。例如人民日报在中国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推出专题报道《奏响“一国两制”的濠江之歌》，全面展现中国澳门回归后的发展成就，体现了“一国两制”在中国澳门的成功实践；人民网大湾区频道在 2025 年 1 月报道了中国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向国际社会传播“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并展现中国澳门在法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体现了境内媒体对“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主动阐释和国际传播。

#### 案例三：国家安全教育案例对比揭示的话语对抗本质

2024 年 8 月，中国香港特区在中国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国家安全展览厅的开幕典礼。该览厅是中国香港特

区首个系统介绍国家安全的专厅，也是中国香港特区首个实体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展览内容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国家航天局任务中收集的月球土壤样本。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展览开幕时提出，保障国家安全是一项“持续”的义务，并强调了在国际形势快速变化、地理冲突不断以及外国势力集体压制面前，必须加强危机意识。

而部分境外媒体利用话语陷阱曲解展览厅起到的国家安全教育作用。在日本共同社、“香港自由新闻”等报道中，运用历史修正主义表述将 2019 年中国香港社会动荡定性为“民主抗争”，却将国家安全教育设施污名化为“爱国心向上”的洗脑工具。如共同社报道直接使用“暴徒”的扭曲表述，将国家安全展览厅定位为“警戒外国势力”、向中国香港民众灌输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国香港自由新闻则通过“security risks”“collective suppression”等话语标签，暗示展览厅是政府强化社会控制的工具。这种话语策略通过重构历史记忆歪曲事实、污名化国家制度的方式设置话语陷阱，将国家安全法治实践与集权控制划上等号，其深层目的在于消解中国香港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集体认知，破坏中国香港民众凝聚起的爱国精神，为西方势力的干预制造舆论支点。

面对境外媒体或直接或暗示性的负面报道以及其中暗含的话语陷阱，国内媒体则通过新华社、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等平台，主要从历史、法治、发展三个角度进行叙事，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话语体系。从历史角度强调“从《开国大典》油画到中国香港国安法国旗”的宪制传承，展陈 1840 年鸦片战争文物与“嫦娥五号”月壤样本形成历史对话，有效引起公众情感共鸣。在法治角度上，突出“基本法 23 条立法与国安法衔接”的制度创新，同时强调展览厅内约 40 条视频和 400 件展品通过可视化形式形象地呈现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展现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香港特区的坚定立场和责任担当。从发展角度创设“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话语连接，将航天火箭模型等展品符号转化为国家科技实力象征，激发起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参观者更以真实体验印证这一话语体系的情感动员效能：市民陈先生（第 5 万名参观者）坦言，展览中香港地区警察修例风波时期的装备展陈让他“回忆起 2019 年的动荡”，而天安门广场飘扬的中国香港国安法国旗与《开国大典》油画构成的宪制传承线，使

其深刻理解“国安法对中国香港长治久安的历史意义”；圣公会基德小学六年级袁同学被展厅内“雪龙2”号科考船模型触动，直言“国家科技实力是繁荣的基石”，并立下“成为警察守护国安”的志愿；九岁小童父亲带全家观展后强调：“互动装置让孩子明白国家安全不是抽象概念，守法尽责需从小学起”，印证了法治教育浸润人心的深层效果。

## 4 话语陷阱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

### 4.1 话语陷阱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潜在威胁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话语陷阱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话语陷阱可能以扭曲历史，否定主流价值观为目的，与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所体现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采用捏造错误故事形象，传播错误价值观的方式，使民众对国家历史和文化产生怀疑进而撼动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

同时，话语陷阱可能粉饰和散播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与主流意识形态南辕北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导致民众的认知和实践均与主流形态相悖，削弱国家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破坏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话语陷阱可能会刻意扭曲新闻报道的真实意思，放大国家政治制度的缺陷进而质疑执政党执政的正当性和适当性，恶意煽动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使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不堪一击，极小的冲突都能动摇国家政治根基的安全与稳定。

其次需要关注的是，话语陷阱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削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话语陷阱可能使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大肆宣扬文化虚无主义的伎俩，使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下降，破坏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导致文化自信的丧失。习近平指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而话语陷阱则会极力吹鼓西方文化优越论，刻意将文化分为高低几等，以“优越”文化的名义挤压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侵犯国家文化主权安全。文化因交流而精彩，话语陷阱却会通过夸大文化差异，放大文化中的糟粕来煽动文化对立，阻碍文化的友好互动、良性竞争，破坏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威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话语陷阱通过抹黑国家形象造成国际声誉的破坏。散布虚假信息、歪曲事实等方式都有可能被媒体利用创制话语陷阱来抹黑国家形象，损害国家国际声誉。话语陷阱可能利用敏感话题诸如领土争端、民族问题等搬弄是非来制造国际争端，离间国家间的关系，破坏国际合作以损害国家利益。

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话语陷阱会通过宣扬错误的价值观，刻意引导国际舆论的发展方向，抹黑国家的各种政策和活动，影响国家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分量，逐渐瓦解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支柱作用，阻碍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壮大。

### 4.2 话语陷阱对国家文化安全造成实际危害

境外媒体利用“民主”“自由”话语标签歪曲中国香港问题。西方媒体刻意创制话语陷阱，在国安法中咬文嚼字，对其实际意思和作用置之不理，反而颠倒黑白地对其“抽丝剥茧”，将中国香港国安法描绘成对“民主”“自由”的压制，声称其侵犯了中国香港居民的“人权”。这种大肆扭曲事实的报道实质上是想引导国际舆论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混淆视听的作用，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怀疑，自然不会自觉遵守国安法的施行，这样的恶意引导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西方媒体刻意夸大中国香港地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无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忽视文化的交流融合，撺掇中国香港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暗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南辕北辙。这种话语陷阱削弱了部分中国香港居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初衷背道而驰，不利于国家统一。西方媒体将中国香港问题归结为中国政治制度的问题，通过抨击中国政治制度，质疑“一国两制”方针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抉择，煽动对立情绪，使得部分中国香港居民对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了不信任进而可能演变为不认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凝聚力和号召力。

## 5 应对策略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重点方向。寻找中华文化的精髓并加以提炼，领悟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特点，促进文化交流交融，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不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国际事务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地位。当前，立足于实现“两个巩固”的目标任务，超越简单的语义辨析和观点罗列，深刻剖析西方“话语陷阱”背后的权力生产机制，戳穿其妄图制造话语陷阱、借助话语霸权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虚伪本质，真正将中国发展进步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逐渐提升解读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是基本保障。加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帮助公众了解媒体运作机制，提高公众的辨别能力，锻炼公众的批判性思维，敦促公众主动思考、保持理性来增强抵御话语陷阱的能力。培养公众理性的表达习惯，引导公众理性表达观点，表达观点三思而后行，不让情绪左右自我认知，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针对西方媒体的偏见、批评、否定和攻击，政府要及时回应，以事实为依据，坚定立场，引导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不实报道应当及时予以澄清，付诸实际行动来回应，营造媒介良好形象，提升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根本途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中国以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中。创新传播方式，运用新媒体技术，探寻中外话语体系的共通点，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表明中国态度，展现中国形象，增强中国故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 6 结语

本文通过文化安全视角的系统分析，揭示了境外媒体在涉港报道中设置话语陷阱和境内媒体正面回应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层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话语陷阱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文化霸权逻辑和历史修正主义等路径，对民族文化认同、国际形象建构和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多维威胁。这一研究不仅深化

了对话语陷阱生成机制与文化安全互动关系的理论认识，拓展了跨学科研究的分析维度，更为关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反制西方话语霸权的策略框架，为媒体从业者揭示了国际舆论斗争的叙事规律。研究提出的加强话语体系本土化建构、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等应对策略，既有助于破解当前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西强我弱”困局，也为在复杂舆论环境中筑牢文化安全防线提供了实践路径，对维护国家主权、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竟辉,张方方. 西方“话语陷阱”的意识形态透视及其中中国应对[J]. 思想教育研究,2025,(02):102-110.
- [2] 石中英. 论国家文化安全[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5-14.
- [3] 王润泽,徐诚. 意识形态偏见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选择框架[J]. 中国记者,2020,(01):34-38.
- [4] 师文,陈昌凤. 社交机器人在新闻扩散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研究——基于《纽约时报》“修例”风波报道在Twitter上扩散的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05):5-20+126.
- [5] 林功成,谷端为,李莹.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话语建构与策略转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9(02):135-146.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12.
- [6] 孙晓鹤. 话语祛魅：崛起国的国际话语权难题——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分析[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24,26(01):45-51. DOI: 10.16147/j.cnki.32-1569/c.2024.01.007.
- [7] 习近平: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J]. 公关世界,2021,(11):5.

基金项目：江苏警官学院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410329117Y